

人口走势能否决定经济发展

——读《人口峭壁》有感

■ 胡艳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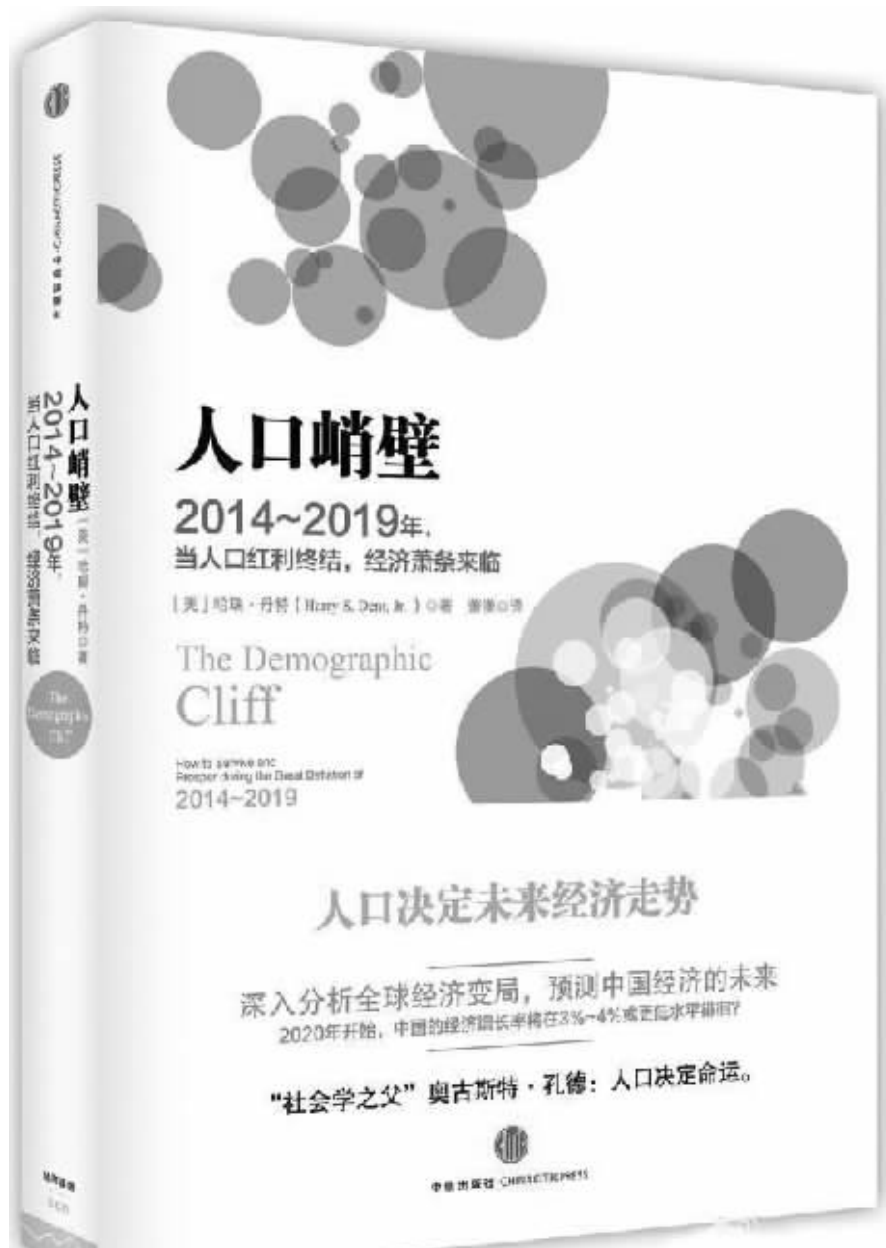
在经济领域,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在磅礴复杂的经济实践中为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寻找证据,而证据就如同照片中的景象,呈现片面的真实。曾因准确预见 20 世纪 90 年代大繁荣而名噪一时的美国经济预测专家哈瑞·丹特在新著《人口峭壁:2014—2019 年,当人口红利终结,经济萧条来临》一书中,便截取了人口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片面风景,盘点美国、欧盟各国、东亚国家过去经济发展走势与人口变化的关系,大胆预测各国攀上人口峭壁的时间,并对各国政府面对经济周期性衰退采取的不当刺激措施予以抨击。

人口变化逃不过经济魔咒

哈瑞·丹特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经他技术化裁剪处理过的世界仿佛被一条有关人口的规律之线牵引,在经济发展的春夏秋冬中循环。他认为人口变化决定各国经济走势,从微观层面,一个人在 20 岁左右步入社会,伴随其成家立业、生育儿女、购房购车,在 46 岁时生产及消费能力达到巅峰,而后随年华老去,消费渐趋保守,不再购置大型商品,由外向开拓投资转向保守消费储蓄。从宏观层面,当人口规模巨大的年轻群体迈入社会时发生通货膨胀,大量的技术创新涌现,经济随之繁荣,而当人口逐渐老龄化,社会整体创新乏力,生产力、消费力滑入谷底,出现通货紧缩,大萧条随之来临。各国政府虽可以通过政策控制未来人口数量,却无法改变现存人口的发展格局,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无法逆转,各国将面临严重的产能、消费不足,除非通过吸引移民改善人口结构,否则面对人口峭壁,经济社会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萧条期。

作者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在社会发展初期,人口数量和结构确实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人口增长没有伴随相应的技术进步,没有解决资源紧缺、环境承载、社会承载能力等问题,那么增多的人口带来的绝不是什么经济红利,相反却是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纵观西方国家百年崛起的历史,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除了和平时期的人口大繁荣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的现代化治理。瑞士国土面积仅有 4.2 万平方公里,人口仅 800 余万,却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创新能力居功至伟。一个国家国民的创新力,并不取决于人口的绝对数,而是取决于国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思维模式。同时,越开放、包融,允许多元文化融合碰撞的国度,越容易产生有价值的创意,在这方面美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同时,作者简要归纳的人生成长及消费图谱,笔者对其普遍代表性存疑。以人的结婚年龄及生育年龄为例,各国及各地区呈现差异化变动态势,消费习惯也因各国国情及文化差异而不同。以中国为例,伴随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生育年龄日渐推后,而传统的啃老式消费习惯又令年轻人的消费水平超越父辈;不断抬高的育儿支



出,在成就了一批新兴行业的同时,也颠覆了作者总结的消费规律。即使中国在未来将面对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结构比例失调现实,但中国人近三十年接受的教育,新世代人口足以产生数倍于父辈的生产力、创造力、消费力。同时沉积在民间巨大的储蓄,如能够有效激活也将成为提振内需的主要资金来源。另中国各地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某些地方存在过度建设的情况,而有些区域又亟待政府加大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这些也将改变作者所说的没有城市户籍、只能游走在城市边缘的 2.21 亿进城人口难以就业的问题。各国均有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经济发展是复杂社会现象的综合体现,实在不能用作者的数字模型简单加以归结、推测。

在技术创新频繁,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已经退居其次。所谓的人口红利更适合于经济处于起步期的后发展国家,未来,创新力将接替人口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教育、文化、政治、对外开放以及各国施行的财政、金融等政策一起影响经济发展走势。

继续豪饮量化宽松这杯毒酒？

作者认为之所以在美、日、欧盟等国家没有完全遵循他所推导出的经济规律,出现经济周期迟滞,主因为政府的过度刺激,即用量化宽松的债务毒药人为阻碍经济放缓和衰退。政府可以一时救市,强拉起一根经济发展的小阳线,却无法扭转经济发展的大势,过度干预经济运行,只能令市场失去自我调校、修复功能。在这一点上,笔者较为赞同作者的看法,经济的衰荣正如一年四季,是其运行的内在规律,唯有经历严寒肃杀之后,才能去除高度繁荣时的经济流毒,修正市场错误,淘洗弱势企业,迎来新一轮健康发展。

正如书所述,大部分经济学家达成了共识“经济是一台机器,组件包括恒定不变的 3%到 4%的增长率,1%到 2%的通货膨胀率,但没有衰退”,人们千方百计的追求增长回避衰退,以至为实现增长而采用的过激手段被种种颂歌包围,更加麻痹了人们的风险神经。过高的债务、超前的消费、过度的刺激这不仅是个别国家、个别人群的选择问题,更是一个时代在鼓吹的纵欲狂欢、提前消费

的生活模式问题,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积重难返。这种模式若想持续,必须以经济的无限可持续为前提,这恰又助长了政府通过人为手段扭曲经济发展规律的动因,限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尽管量化宽松所带来的长期负面效果各国心知肚明,但戒除经济的迷幻药,却不那么简单。首先,没有哪一届政府愿意承担起经济放缓或者迟滞的罪名,经济发展一旦显现下滑苗头,各种救市刺激措施便会不计成本地抛出,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在利益引诱下,被越吹越大,而接棒者便只能继续做这个击鼓传花游戏,当音乐停止以后,经济将如自由落体迅速跌落,殃及众多国家和民众。其二,在金融与房地产的泡沫中,曾经受益最大占据了 80%资源的 10%人口,他们有制订政策、操纵市场的能力与手腕,即使他们嗅到了经济危机的危险气息,也不会亲手中断自己的财富之源,他们会备好金色降落伞,留下不明真相的普罗大众承接衰退之痛。

泡沫终究有幻灭的时候。当过度投资、过度建设达到顶峰,投入资源成为沉默成本;当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外向出口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受挫;当人口老龄化曾经被抬高的房价呈自由落体跌落,个人债务无法通过再融资获得中转之日,便是经济持续繁荣的梦醒时分。

中国是否有机会治疗发展之伤

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力,该书在“中国城镇化悖论与即将破灭的大泡沫”一章中,集中火力炮轰了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认为中国正如美国印钞票般印制各种建筑,过度建设积累了太多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危机正在潜滋暗涌,其危险程度已然超越了中国其他国家。有可能步美国 1930 年大萧条的后尘,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警钟的声音是刺耳的,作者的言论无疑将引发中国读者强烈地质疑、反驳,但笔者认为作者引用数据的真实性、准确率,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批评是否过激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与其辩驳不如自我反思、警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繁荣》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曾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城镇化’而是‘创新’,发挥企业的创新作用,才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在未来,中国最需要经营的是个人、企业、国家的创新智慧,而不是房地产和农村城市化。中国经济 30 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一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适当放慢发展的脚步,调校错误、修正偏差、清理流毒,对于中国经济长久健康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众多因素综合起效的结果,不能单纯地归因于一两项指标,同时全球人口也会因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原因实现更多的全球流动,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短期波动。在全球经济合作日趋紧密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纵然过程复杂,但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将逐渐大趋同。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后发展国家将以超越西方的速度完成工业“进化”、社会“进化”。

2014 年是互联网金融创业年

■ 黄震

最近很多人问,互联网金融如此绝好的大势来了,创业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2013 年创建的互联网金融千人俱乐部,吹响了互联网金融创新创业的集结号,进入 2014 年形势已大为不同。首先是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已经得到政府工作报告的认可,而且促进发展的政策意图表述非常清晰,让人们不再存在心存疑虑和不确定性,这是政策环境的利好。

其次,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使今后的创业一定是在以移动端为起点,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支持的背景下搭建平台,互联网金融创业主要考虑项目、平台、园区、协作机制。

第三,用户习惯已经培养起来,广大网民已经接受和习惯了买余额宝理财,用微信支付滴滴打车,相当于建好了高速公路,就等我们勇敢的创业者开着奔驰上路。因此,我断言,如果说 2013 年是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元年,那么 2014 年便是互联网金融的创业年。

考量项目与平台新思维

互联网精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从对象本位出发,也就是从客户、用户本位出发来设想创业服务,现在的传统金融机构为什么做不好? 因为它们已经是生产了产品后卖给客户,缺乏从用户出发的理念。阿里根据支付宝上用户现有的需求和用户体验特征来设计余额宝产品。如果只看到它的渠道功能是不对的。最根本的是用户中心、用户起点的思维。

今后互联网金融创业,首先一定是从用户需求中出发,挖掘用户的痛点,提供解决方案。现在,很多人没有发现用户的痛点在哪儿,然后提出解决方案,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化,所以一些项目可能看上去很美,但未必能够成功。

第二,如何考察项目?中国人的创业思维就是谁挣钱了就跟谁,总想复制别人的成功,其实这是创业的大忌。确实,在某些时代,美国做成了一个门户网站,中国也做一个门户网站,也能够成功,那是一种特殊制度环境下造成的。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复制、剽窃,就可能构成知识产权犯罪。所以创业要考察过往成功的项目,但是更应该从别人的成功之外去找差异化,找不同点,找跟别人能形成错位协同的领域。创业的成功者必须是细分行业的领军人物。

第三,创业项目的方向性。如果对技术潮流和方向没有理解,就会“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以往的企业制度,都是对传统、历史资源的整合,而现在互联网精神是“未来”的思维方式,即如何将未来资源整合进来。如果企业制度没有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很多创意就不能变现。

产业园区与协同创新趋势

我前些天在湖南、深圳等地调研时发现,政府拿出很多土地和资金来支持企业,但他们看到的还是实体世界,而互联网是已经重构的世界,所以如果还是只在实体空间上考虑集聚,而没有考虑配套的网络空间的集聚,那么产生的成效会大打折扣。

互联网金融创业不仅要有产业的园区化的平台创业,也需要有社会行业组织的创业。现在,中央鼓励社会创新,所以用社会创新的方式来支持产业的发展。社会企业即是股东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创造价值、做单个企业不能做的事为目标,来填补产业链中的夹缝,把它们连接起来。

最后,创业的碰撞除了线上还有线下。进行社会创业是互联网的节奏。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微信群,这是最便捷的方式,社会创业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简单,看准“带头人”,跟着他看和学,领略到创业的方向,这样激发了创意,或者发现了感兴趣的创业点之后,把创业项目中间需要的其他的点上的人连接起来。

互联网金融创业中法律技术很重要

互联网金融的三大核心技术:IT、风控、法律。IT 是一门技术活,风控也是一门技术活,大家都容易理解。但是过去很多人把法律理解成静态的条文,这是对法律极大的误解。其实,法律也是一种活的技术,要能够应用到产品研发、交易结构、风险控制和合约设计,让各方权利义务实现平衡也是一门技术。

过去形成的法律体系是基于过去的经济社会的时代特征,在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法律的现代化基本是在移植西方的法律体系。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机会,互联网世界的崛起,很多规则还没有被发现和提炼出来,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中国几乎与西方同步开始探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我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发现规则、提炼规则。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没有这些规则和规范,良好的运行机制就不能形成。2014 年在规范的基础上,互联网金融的创业才能更健康发展。

我预言,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在金融改革中从辅助性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因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已经把用户抓到了自己的手里,将来积累大数据,所以互联网金融可能从传统金融机构的打工仔变成颠覆者。

虽然很难预言互联网金融将来的形态如何,也不能准确判断互联网金融企业创造的价值具体能达到何种量级,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很幸运赶上了这一波千载难逢的互联网金融创业高潮。

“海外追杀令”应成为新常态

■ 罗天昊

近日,澳大利亚警方将查封中方通缉的 7 名重要经济逃犯的资产。潜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境外逃犯估计携带数亿美元。人均超 1 亿,协助中国在澳追踪非法资产。据传,本次澳方的行动,主要是配合中国警方发起的一项名为“猎狐行动”的重要举措,此项行动瞄准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展开行动,中澳警方已就一份优先处理名单达成共识,名单从“一份不到 100 人的大名单”中选出,确定首批经济犯罪嫌疑人名单。

农历上年末,本人提议国家应该发布“海外追杀令”,对于外逃的贪腐官员及其家属,进行海外惩治和追诉,相关提议与国家层面的反腐动向不谋而合。

年初,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涉及到六种不得被列为考察对象,不得提拔的条例,被外界称为“六大禁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条,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提拔。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裸官不得被提拔。裸官之害,全民皆知,过去十年,对于裸官的治理,语焉不详,而中央本次下猛药,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大势所迫。

近年来,裸官的出现,既严重恶化了官场生态,亦对全社会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在被曝光的贪腐官员中,其贪腐金额,动不动

就达到上亿乃至数十亿之巨。这其中,到底有多少财产被转移到海外,成为国家流失的资产,目前尚无准确官方统计。

不过,有一项统计,或可管窥。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中国建设银行过对 2011 年和 2012 年两年的调研,中国富人向海外转移的资产,仅两年即达 2.8 万亿元,约相当于中国 2011 年 GDP 的 3%。超过当年中国教育经费与社保总投入。转移的资产中,绝大部分是房产、债券和股票,实业投资仅占 14%。

在这些转移的资产中,企业家阶层仅占 56%,剩下的除了明星,专业人士外,是些什么人? 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此外,裸官还可以通过一些灰色渠道,洗白黑钱,比如一些全球大赌场,很多时候就有来自内地的豪客,其中部分人士,已被探明为贪腐官员家属。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前行行长许超凡的妻子,就曾因在拉斯维加维洗钱而被美国警方通缉。而被起诉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没有被起诉的,则堂而皇之地完成了家族海外财富漂白之路。

裸官通过家属到底在海外建立了多大的资产,目前尚无确切官方数据。但是其危害却极大,既损害了官方声誉,又对于国家财政,民生投入造成巨大损耗。为此,根治裸官之祸,必有霹雳手段。

裸官最为油滑和无所顾忌之处,在于通

过妻儿亲属,将财产转移到国外,本人在国内贪腐,一旦事发,一人托底以保存整个家族。虽本人身陷囹圄,贪腐的财产却仍然由家属在海外享用,免除了后顾之忧。近年来,中国海外留学生猛增,其中不少就是国内官员子女,一旦官员失势,尚留根在海外,既有良好教育,亦有遗留的巨额资金,起点高企,不仅对于国内广大勤劳民众不公,对于海外国民亦不公,部分国家加大打击中国海外贪腐官员家属,也是出于此种考虑。贪官家属的狡诈不法,引起的不仅是国内之怒,在海外也引起公愤。因为不劳而获的巨大财富,也破坏了海外国家的社会公平。在一些法律完备,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国家,并非有钱就是大爷。

对于贪腐官员,不仅要追究本人的刑事责任,其家属如果不限期交出贪腐所得,应视为共谋,起码应视为不当得利,可向其移民所在国,发布公函,以协助调查。

目前,与中国建立引渡条约的国家不多,客观上助长了贪官及其家属逃匿的机会。同时,一些贪官和家属,往往以“政治避难”为借口,在一些比较注重个人人权的国家滞留,中国应扩大引渡国范围,必要时可派遣“海外追杀团”,先在国外将其擒获,再通过外交途径归国。

逃到国外的托洛茨基难逃斧劈之死,中国也有应对逃亡海外的违法公民的惩治能力。凡犯中国法律者,虽逃到天涯海角,亦

不可逍遥。

针对外逃贪官以及其海外家属,发布“海外追杀令”,正是顺应时势之举。

绝不能让裸官家族“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而应该是“如有一人贪腐,全家不得安宁”。

在进行“海外追杀”的同时,亦应防范未然,最大的制约因素,即是尽快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如此双管齐下,必可阻国家财产流失海外,必可斩断裸官国外残留势力。既廓清天下,还万民公正,亦保全国家财富,留为万民所用。

同时,“海外追杀”应成为常态,让一切裸官,以及外逃的贪官及其家属,惶惶不可终日,造成巨大的震慑力,也让后来者不敢贪,不愿贪。

此外,“海外追杀”还可平息民怨。当下,一帮“美国人他爹”成为中国最阴险歹毒的汉奸和卖国贼,他们中有些人在台上人模狗样装领导,鼓吹民间仇美,台下却把子女送去美国留学,甚至移民欧美国家,通过家属在海外洗贪腐的不义之财,洗官倒房倒矿倒的不义之财。把中国万民创造的财富,变成欧美国家的钱,变相成为最大卖国贼。“海外追杀”可有效打击中国最大的汉奸群体“美国人他爹”。

一边在中国当官,一边当美国人他爹,美国留学生他爹。部分虚伪阴险的中国官员好梦到头了。海外追杀,生生不息。